

思之惘然

文 宋子江

夏天從多倫多回港不久。鄭政恆和我相約在尖沙咀商務印書館談現代詩，題為「詩的世界與外面的世界」。三年疫情後，詩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都一片混亂。所不同的是，在香港，詩以外的世界則在秩序和混亂的交替中起伏，而詩的世界則從來都是混亂的。多得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及一本讀書會的朋友組織，我們暢談混亂中的詩刊編輯和詩歌翻譯，好不愉快！

鄭政恆留意到《聲韻詩刊》比較重視譯介現當代美國詩歌。的確如此，「譯介天地」欄目有許多較小型的譯介通常是關於現當代美國詩人，或居住在美國的詩人，例如今期就有塞爾維亞裔美國詩人查爾斯·希米克（Charles Simic；鍾國強譯）、瑪麗·奧利弗（Mary Oliver；王深譯）和烏克蘭裔美國詩人伊利亞·卡明斯基（Ilya Kaminsky；kari 譯），另外還有我的「詩匠譯苑」專欄的〈龐德《詩章》五〉。這個欄目是開放投稿的，出現比較多以英文寫作的詩人也不奇怪，畢竟在香港，除了中文，懂英文的人比懂其它語言的人更多，而且實踐轉譯的譯者並不多。

鄭政恆也指出不同身分對翻譯是有一定影響的。這一點，我特別同意。若聯繫起《聲韻詩刊》來談，那就顯然有兩種翻譯身分：一是作為詩刊編者為詩刊譯介而譯；二是作為詩人譯者帶著詩學信念和翻譯理念而譯。作為前者，「編譯」或者「譯介」主要是一項介紹性工作，眼光要放廣闊，容納各種詩風，轉譯是可以接受的，同時希望將來有識之士可以進一步深入探索。作為後者，詩學因素會比較強，眼光也因此會挑剔一些，其翻譯會體現譯者對原作在詩學層面有其獨到的理解。翻譯在詩學上對自己有啟發的詩人當然是最理想了，可是在實際生活中，翻譯的動機不一而足，有時只是機緣所造就，不能一概而論。

《聲韻詩刊》規模稍大的譯介專輯，通常都不是關於英美國家的詩歌，例如大約一年前《聲韻詩刊》第64期的「烏克蘭詩歌：自由的歷程」專輯。這個專輯體現我主編《聲韻詩刊》這段時期一直重視譯介的特點，除了撰寫長文介紹烏克蘭詩歌的歷史與當下，還轉譯了不少當代烏克蘭詩人的詩作。鄭政恆選讀了的則是十九世紀烏克蘭詩人塔拉斯·舒夫真高（Taras Shevchenko）感人至深的〈遺囑〉。作為一以貫之強調烏克蘭文化身分的詩人，塔拉斯·舒夫真高在當代烏克蘭備受尊崇。許多城市的牆上畫著他宏偉的畫像，鈔票上印著他的頭像，大馬路和文學獎以他命名，令人肅然起敬。

不過，《聲韻詩刊》重視譯介，並不意味著忽略創作，平均每期刊登35位本地作者的作品。今期有劉偉成的「時代三輯」、「讀音」專欄中的律銘、雄仔叔叔和枯毫，還有曾淦賢編的「愛慾詩輯」。近期多得李榮浩的努力，《聲韻詩刊》持續刊登詩人訪問，今期的訪問對象是黃燦然。此外，闊別數年的「鄰城視界」欄目又得以出現，深圳詩人梁小曼的短文〈我生於粵語之中〉讓大家看到粵語語系內部千絲萬縷的關係。英文部分則繼續刊登本地及海外詩人以「Crossings」為主題的詩，可謂眾聲喧嘩。

講座結束後，我們一行人移師佐敦的冰室。文學活動之後的聚餐通常都別有一番味道。擾攘一番，大家安坐下來，以奶茶代酒水，交換近況。笑說不少近年的文壇秘史後，大家都感慨三年疫情間詩人一來二去，詩壇都物是人非了。說起物是人非，我又想起了已經去世十年的梁秉鈞（也斯）。如果香港是一座尊重詩歌的城市，梁秉鈞在香港應該有塔拉斯·舒夫真高在烏克蘭的地位吧。香港是不是這樣的城市？思之惘然……